风土建筑学科化研究方法及成果综述

Review on Methodology of Modern Vernacular Architecture Study

潘玥 | PAN Yue

中图分类号：TU-09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6740(2024)02-0099-09 DOI：10.12285/jzs.20220728002

摘要：在建筑遗产的保护问题中，比起已被列入保护名录的文物建筑，如何应对大量处于保护名录之外的城乡风土建筑遗产的“存”与“废”是我国城乡演进过程中的核心问题之一。针对国内相关研究较多集中于风土建筑本体和保护实践的研究，对风土建筑学科方法论的回顾研究较为不足的现状，文章尝试整理现代风土建筑相关研究成果进行分类综述和评价，并对其使用的学科方法进行归类总结，为我国应对此类量大面宽的建筑遗产的研究和处置补足方法。

关键词：风土建筑、学科方法、保护、回顾

Abstract: In the conservation of architectural heritage, compared with the heritage buildings that have been listed in the list, how to deal with the large number of urban and rural vernacular architectural heritage is one of the core issues in the process of urban and rural evolution in China. In view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that domestic related research is mostly focused on the substantial entity and conservation practice of vernacular architecture, but the retrospective research on the methodology is insufficient, this paper attempts to sort out the related research results of modern vernacular architecture, and make a classification and summary of the disciplinary methods used, which will be a complementary method for the research and disposal of such large-scale and wide-ranging architectural heritage in China.

Keywords: Vernacular architecture, Modern methodology, Conservation, Review

一、引子：风土建筑学科化方法的形成

风土建筑（vernacular architecture）的现代存续和保护再利用是国内外学界的热点话题。从1999年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通过《风土建成遗产宪章》（*Charter on the Built Vernacular Heritage*）以来，关于风土建筑的保护不断以保护纲领形式取得制度性的进步，并在国际社会达成共识，这也意味着风土建筑的研究进入了建筑学的前沿[①]。作为广义遗产类型的价值认知及实践，伴随着风土建筑相关保护运动与19世纪的现代观念扩张一同兴起，其研究范式与现代学科飞速发展和文化反思进程紧密关联，日新月异。笔者认为，对现代风土建筑学科化研究方法及成果的及时回顾，有助于在风土建筑遗产濒危的今天打开视野，理解国际学界提倡风土建筑抢救性保护的历史语境和多学科方法论，在他者的历史经验中探索我国风土建筑遗产的当代存续方法，是融合前沿视野、现代学科和在地探讨的新型风土建筑研究和存续工作的重要基础。

构成国际公认的风土建筑基本研究对象和学科框架集大成于《世界风土建筑百科全书》，现代风土建筑以多学科的研究方法进行，涉及的学科方法共有20种，对应着大量传统学科譬如建筑

作者：
潘玥，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建筑系副教授。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52108026）。

录用日期：2022-10

学、美学、考古学，以及新兴的现代学科门类如博物馆学、地理学、生态学等，这些研究方法包括：美学的（aesthetic）方法、人类学的（anthropological）方法、考古学的（archaeological）方法、建筑学的（architectural）方法、行为学的（behavioural）方法、认识论的（cognitive）方法、保护工作者（conservationist）的方法、发展式的（developmental）方法、传播论（diffusionist）的方法、生态学的（ecological）方法、民族志学的（ethnographical）方法、进化论的（Evolutionary）方法、民俗学的（folkloristic）方法、地理学的（geographical）方法、历史学的（historical）方法、博物馆学的（museological）方法、现象学的（phenomenological）方法、记录和文档化的（recording and Documentation）方法、空间的（spatial）方法，以及结构主义的（structuralist）方法。

对这 20 种已经建立的风土建筑研究理论，在列明要目之外，需对每一种理论和方法进行梳理，阐明该理论和相关风土建筑研究的发展情况，指出该方法的特点和不足。梳理这些对过往研究的详细总结和细致剖析为下一阶段的风土建筑的科学研究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基础。其中相当多的成果，与风土建筑以往研究中的实证性部分可起到互为补充之用的理论解释和研究模型，可合并门类择取评述。

二、风土建筑的学科化方法及代表性成果

1. 作为学科基础的美学方法论

美学维度的研究方法被最早应用于风土建筑的研究，构成风土建筑作为现代学科的研究传统和支撑基础。美学是交流中几乎最有效的方面，这一维度是直观的，能够使情感愉悦，使感觉处于兴奋。所有交流同时都会诉诸理性与情感，例如在演讲时，交流包含了理性、逻辑化的内容。但同时，演讲者传达的语言从美学角度而言是非常复杂的，因为语言被扩展了，包括句式的重复与平行，节奏、音律与语调的变化，词语的选择和比喻等等。同理，从美学角度而言，很难按实用主义方式把建筑简单切分成遮蔽功能及社会文化功能。一座建筑扮演的角色和实际的功能，它的设计和建造、外观和空间，每一部分均有美学潜在要素。

美学方法论指的是在由“美学诉求”驱动的对风土建筑的研究中，采用一种“回应式”（responsive）的立场进行研究的往往是建筑师群体，对他们来说，在过去一个半世纪中，风土建筑代表的是一种“发现”，也是一类范畴——一种必要的概念的创造——由建筑学的思考者最初对于过度装饰或低劣装饰的厌倦，含混的功能、空洞的象征、错误的材料、虚假造作的表达、粗暴的回应环境、社会性缺乏等种种建筑学问题的焦虑生发。出于对传统消亡的痛苦，这些思考者才转而研究这一过去被学术编年史一贯忽视的领域。其建立“回应式”的研究体系，研究风土美学，将其构筑为现代运动的必要特征。

美学方法主导的风土建筑研究主要有两类成果，一类是“民族志学”的（ethnographic），研究者出于理解传统建筑的建筑者与使用者所反映出的其所处文化的美学维度。该类研究的目的是为了创造一种看待建筑实践和经验的更为全面的视角，平衡出于实用角度的解读，既要考虑建筑的遮蔽功能，又要考虑社会作用而成的象征性。研究特点是，风土建筑与其他物质文化形式一同用于呈现某一特定时期在某一特定地点的特定人群的特征。另外一类则是“回应式”的，研究者主要为建筑师，其努力是为了遴选出被长期忽视的这类建筑对象，将之纳入学术研究领域，这种研究的目的是为了拓宽建筑审美领域的范畴。这种研究常被混合，但还是可以从受这一美学理论影响的建筑论述中被区别出来。

在建筑的建造和设计中，人们会感受到不快或愉悦，这是一种依赖于身体的反应。这种反应是建立在人人都有的内在能力上，是一种天生的辨别力，辨别何为愉悦之物，何为反之。在人成长的过程中，这样的能力也在发展，人们在社会经验中逐渐将这一能力导向一种普遍的而深植于心的态度，这不是一种能言说的东西。这些复杂性共同作用使文化以一种普遍的形式得以传承，因此正是所属文化差异程度决定人们互相之间有无认同感。

美学表达的意愿似乎在装饰上最为显著。装饰可能覆盖了某座风土建筑的立面，成为艺术表达的舞台。但也可能出现形式与装饰的分离，比如爱尔兰和土耳其的风土建筑，外表看起来十分朴素，显然是理性与实用性的作用结果，内部装饰则在色彩、肌理、形式上都异常丰富，包括装饰画、陶瓷等。

美学表达也会微妙地在风土建筑的形式与技术上显示。以日本茶室为例，其美学表达不仅限于室内壁龛内的卷轴和花瓶的摆放，还包括房间的尺度、高度、开口大小、地板、墙面以及与之相符的茶道仪式中的用具。

正如弗朗兹·博阿斯（Franz Boas）在《原始艺术》（*Primitive Art*）一书中强调的，对于美学的发展而言，技术的推动作用必不可少，日本或英国的木构建筑的精致节点便是如此。风土建筑最为常见的雕塑般的外形与精妙的空间布局相结合的现象，会使得研究者认为形式来源于功能，但事实上，功能相同的建筑未必有着相似的形式，美学传统的差异使得建筑出现各种形式，倾向于朴实无华还是富于装饰，选择对称还是不对称的形式，使建筑形式连贯或不连贯，倾向于隐藏还是暴露当地材料等。

进一步的，“回应式”研究还可更详细地按观察者对建造者意图的态度进而划分为三种角度：“解读”（interpretation）、“保护”（conservation）、“使用”（consumption）。

“解读”角度的研究指的是在进行民族志学研究时，通过对建筑的形式分析，提炼和系统化，揭示出设计过程中的“变”与“不变”。这个时候观察者自

身的价值观应被排除，如实反映建造者的意图。“保护”角度的研究中，出于自身的价值体系，建造者的意图会被保留，有时候与观察者的意图混合在一起，研究目的是为了遴选保护和记录的对象。“使用”角度的研究中，建筑被作为美学对象，已被完美地纳入观察者的价值体系，建造者的意图不再需要花费努力研究。

建筑师群体所采用的“回应式”研究，特别是在出于“使用”这一角度进行研究时，研究者趋向于把风土建筑想象成是一种或“原始”或“民间”或“流行”或“无名”的文化复合物。在近代西方被视作主流建筑专业实践对立面的一种“对象”，或者说这些研究者进行了一种新范畴的“建构”。其中，风土建造者通常都被形容为更单纯、更少刻意的、更为自然的理想群体。于此，建构出一种“对立”，或者与“他者”的距离，即：“我们的”是个人化的、科学的、进步的和现代的；“他们的”则是社群的、精神的、和谐的、克制的、与生态进行调适的、固定的、不合潮流的。至此，风土建筑成为一类特立独行精神的标志，被纳入到对现行西方价值的再确立或批判的争论之中。

因此，在“回应式”视角驱动下的研究出现泛地域化的研究也就不足为怪了。这类研究是为了在泛地域化的形式策略中找到本土问题的解决方式，或曰提升自身文化下的实践能力。既然风土建造者可能会借用都市流行的形式，譬如一名瑞典或者美国农民会在前廊加上一个新古典主义的门廊。那么相应的，都市建筑师也可能在乡村找到他们想要的答案。以一系列建筑师的足迹为例，出于躲避本土建筑专业模式的局限，麦金托什（Charles Rennie Mackintosh）研究苏格兰的风土建筑；柯布西耶（Le Corbusier）进行“东方之旅”，从巴尔干与土耳其的风土建筑中学习。他们均是“回应式”的研究者，泛地域化地努力寻找新的综合方法（Syntheses），将风土元素融入现代主义建筑的创造中。还有比如菲利普·韦伯（Philip Webb）为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设计的位于英国肯特郡的红屋（Red House）可作为例证（图1）。

在古老的英国谷仓、日本农宅、意大利小城、希腊乡村之中，这一类型的研究者到处寻求灵感，他们发现的价值隶属于风土美学，而这些研究成为了现代主义运动的一项必须的元素。建筑师群体在建构“风土建筑”这一范畴时其出发点实际上依然是出于该群体的立场和共同的价值观，风土建筑作为一种“理想形式”的寄托，成为现代主义建筑学习和“想象”的对象，以补足现代主义美学中的某种“遗漏”和不足。

2. 作为重要借鉴基础的人类学方法论

在风土建筑研究历程中，人类学发展对其形成的影响，其深度都远远超出了对建筑象征物的社会文化背景式的介绍，是风土建筑学科方法中最为重要的借鉴基础[②]。

以原始住居来证明建筑进化论思想在西方很早就存在。维特鲁威的《建筑十书》中除了讲述多立克柱式的来源之外，认为庙宇的原型是枝干搭成的棚屋。这种理想化的希腊式假定构成了文艺复兴一系列著述的基础。显然这种起源更为关注的是从图像上去考虑构筑的原型，而不是以人类学的方式考察，因为在当时显然没有具备人类学这种强调文化敏感性的研究基础。从 18 世纪中期开始，启蒙运动思想的传播引发了经典建筑起源考察上的转向。劳吉尔（Marc-Antoine Laugier，1711—1769）在《建筑论文集》（*Essai sur l´architecture*）中认为建筑体现的真实与美是建筑纯净性的最重要因素[③]。原始棚屋成为建筑的理想范式，四个树干支撑顶棚的棚屋所体现的真实与美这一内在特质，不仅体现在神庙上，也是建筑本身具有的理性体现，这也随之成为后来延续一个多世纪的现代运动的重要原则之一。进一步的，钱伯斯（William Chambers）1759 年的著作《民用建筑论文》（*Treatise on Civil Architecture*），对原始棚屋进一步加以哲学化地描述，历时地描述多立克柱式的源起及一系列演变[④]。（图 2）

从 19 世纪早期开始，进化论的研究产生新的转向。在浪漫主义的影响下，建筑的争论中心从建筑的原型与起源转向对拿破仑时代之后建筑文化发展的追溯，

图 1：红屋外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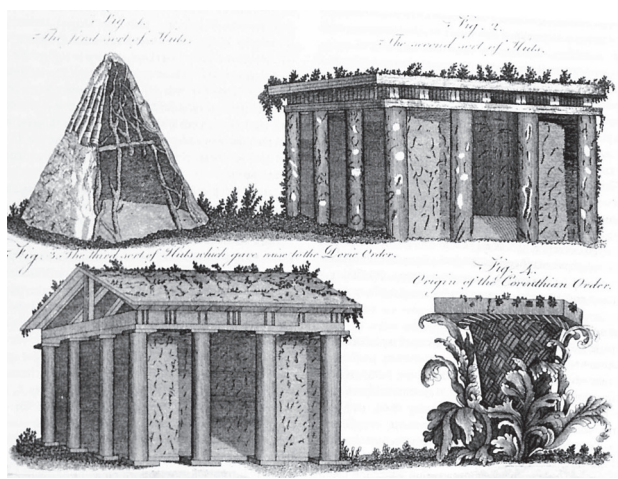

图 2：钱伯斯 1759 年对原始棚屋（the Primitive Hut）的早期演化

因此相对于对经典建筑的兴趣，很多国家开始转向对自发生长的传统建筑的研究，即呈现为风土景观的次要建筑（minor building）。紧接着，1859 年在英国发生了两件事，一件是理论界的成果，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1809—1882）发表进化论《物种起源》（*On the Origin of Species by Means of Natural Selection，or the Preservation of Favoured Races in the Struggle for Life*）；另一事件则是菲利普·韦伯（Philip Webb）完成的红屋，被认为是第一座真正的现代建筑。进化论的革新观点影响了两个著名的建筑学引领人物，森佩尔（Gottfried Semper，1803—1879）和维奥莱·勒 - 杜克（Eugène Emmanuel Viollot-le-Duc，1814—1879）。

1860 年，森佩尔在其《技术与建构艺术或实用美学的风格》（*Der Stil in den technischen und tectonischen Künsten，oder praktische Äesthetik*）一书基于实证主义的态度，通过比较各个时代和国家的建筑，形成了建筑派生过程的解释。他将加勒比海的原始茅屋作为参照发展了四种主要的建筑起源：编织、砌筑、木工，以及石造。他对材料的追溯不是将其作为客观存在的四要素，而是作为建筑的“形式源头”“制作工艺”呈现的形式象征和装饰要素的关联[5]。

民族志学的基础性贡献开始引发建筑进化论朝向人类学角度研究发展。19 世纪晚期开始，关于物质文化的研究开始系统性发展，按照人类学运用的方式，研究不仅注重居住形式本身，还注重其内部和外部的关联域，即家庭与社会的种种复杂关系。这一思想也是美国人类学家路易斯·亨利·摩根（Lewis Henry Morgan）秉有的。在他 1881 年出版的著作《美国土著居民的房屋与家庭生活》（*Houses and House-Life of the American Aborigines*）中，摩根曾采用一种社会进化论的视角系统检视了大时间向度内的居住秩序演进。研究得出三个进化阶段：蒙昧、野蛮与文明阶段。这些阶段进一步依据技术发明分为更细的阶段，例如在蒙昧时代的发明火、弓、陶器；在野蛮时代的家畜豢养、农业与炼铁术；以及在文明时代拼音文字与书写的发展。摩根的研究把房屋建筑的发展与社会的发展相联系，进一步地，揭示亲属关系作为社会的基本构件，建筑空间与血亲关系有着物质对应和空间投射[6]。

到 20 世纪 30 年代，以进化论方法研究风土建筑方面较有代表性的是蒙唐东（George Alexis Montandon）的研究。通过物质实存资料中的居住形式所反映的社会组构和经济活动来作进化程度的划分，蒙唐东得出以下 12 个深奥的“基础圈”：（1）原始圈（Primitive cycle，树枝遮蔽和圆 / 穹顶状遮蔽物）；（2）回旋镖圈（Boomerang cycle，圆 / 穹顶状遮蔽物）；（3）图腾圈（Totem cycle，圆柱形 - 圆锥形棚屋）；（4）双层级圈（Dual Class cycle，方形棚屋双侧坡屋顶）；（5）弓圈（Bow cycle，平台上的方形棚屋）；（6）苏丹 - 波利尼西亚圈（Sudanese-Polynesian，石基座上的方形棚屋）；（7）北极与田园圈（Arctico and pastoral cycle，土中御寒建筑、圆锥形帐篷、黑色沙漠帐篷）；（8）墨西哥 - 安第斯圈（Mexican-Andes cycle，家宅、城镇以及纪念物）；（9-12）印度、古中国、伊斯兰和地中海圈（Indian，ancient Chinese，Islamic and Mediterranean cycles，家宅、城镇以及纪念物）。

1950 年代起，人类学家克洛德·列维 - 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的批评开始影响进化论的流行。他认为进化论具有一种忽视文化多样性的倾向，任何民族的文化均以欧洲中心论的角度进行刻板解读。对于列维 - 斯特劳斯而言，任何一个人类社会因其不可复制的历史环境个别性而无法进行复制性的研究。他因此采用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式的术语寻找共时分析和历时分析的联系，也可以更宏观地说，研究历史和结构的关系[7]。

在 1960 年代之前，对风土建筑的研究兴趣集中在对住宅的传统形式及装饰的记录和分类，以及建造类型在各历史时期的传播与重建上。这段时期的人类学研究著作中，关于住宅和生活习俗的记述颇丰，但风土建筑并未在人类学中被看作专门的研究对象看待。功能论（functionalism）在 20 世纪前半叶为人类学田野调查的主导理论，其关注点相较于物质实体而言更多在于社会结构。到 1960 年之后人类学转向新的关注点——理解风土建筑本身，该转变与鲁道夫斯基的贡献有关。他于 1964 年的著作中指出“没有建筑师的建筑”其“人文性”在于风土建筑以有机的方式融入自然环境。出于一种人类学式的兴趣，许多相关的人类学研究开始出自于建筑师，他们的研究目的不再是描述和分类，而是如何在其本土语境下理解这些形式。

人类学研究中所追溯出的另一项对建筑形式有影响的文化要素则是象征的观念。这类见解最初来自于一些德国结构主义的先驱，并深刻的被法国社会学家爱米尔·涂尔干（Emile Durkheim）和马瑟·牟斯（Marcel Mauss）1903 年发表的社会理论影响。该研究群体认为，社会是一切象征分级形成的来源。人的智力具有分级能力，社会与象征的分级则有着形式上的关联，象征分级是由社会的形式决定的，人的一系列分级概念，比如关于时空的观念、等级、数字、阶层等均是社会的产物[8]。

对人类学研究者来说，一个现有的建筑形式是否源于某种文化观念，或者这一形式是否为技术推动都不是关注的核心，最重要的是形式被赋予的意义。一栋风土建筑可被看作是传统社会中人类最重要的一项立体创作：人们创造出自然空间中的人工空间，在宇宙中划分出一片有边界的区域，因此这一过程可看作是对世界的观念化过程。比如在东南亚，立在木桩上的建筑被视作对三重宇宙的象征性表达，如同一个微缩的三重宇宙，竖向上的三层，天界、人界和地界对应的就是建筑的屋顶层、屋身层和架空层。在这些象征性角度的分析中，社会观与宇宙观互相交织，密不可分。社会与宇宙存有的正确顺序的观念在一座房屋的建造过程中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决定房屋的建造的细节和关键的

位置。其代表研究是 1930 年间马塞尔·格里奥列（Marcel Griaule）和他的学生热尔梅娜·迪代尔朗（Germaine Dieterlen）完成的对非洲马里中部山区的多贡人（Dogon）住宅的研究。他们推演出一套复杂的宇宙观如何先是由一套深奥的拟人（anthropomorphical）系统表达，随后再在建筑群的布置和建筑形式上体现（图 3）。

即使这一方法本身也受到一定的质疑，结构人类学仍保留着这种“整体论”的观点作为其理论基础，也就是说分级（或者说秩序）在整体上受到来自文化的多种层面的影响。克拉克·坎宁安（Clark E. Cunningham）对印尼帝汶岛的阿托尼（Atoni）住宅进行的研究表明，空间的布置，形式的细节，住宅的用途，社会的、政治的和宇宙的观念都是以整体系统化的方式互相关联作用的。在前文字时期，家是这种分级的集合，是表达观念的所在[9]。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基于对阿尔及利亚柏柏人（Berber）社会的观察形成的著名研究所强调的是在象征现象中所传达的关于男女关系的观念。男性与外部世界相连，被形容为一种开化的、明亮的、多产的象征；而女性则形成对立的矛盾面，是晦暗的象征，代表内部空间，处于需要受孕和光照的位置。柏柏人住宅门的位置有特殊的意义，主门必须位于东侧，以纳入真正的光线进入入口，也就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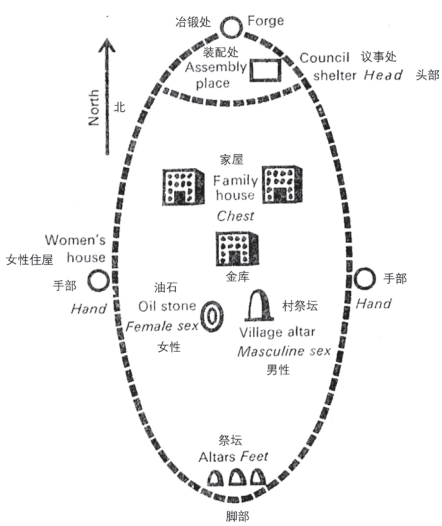

图 3：非洲马里中部多贡人（Dogon）风土聚落的理想平面与拟人（Anthropomorphism）系统

象征男性这一盏“来自外界的灯”发出光芒。布迪厄如此评价道，这是远古以来两性在长期日常生活的无声对抗中逐渐形成的特征[10]。

对于建筑学而言，人类学家这一专业研究群体的研究手段是重要的学习来源。建筑师需认识到他们的设计是一种概括（generalization），是基于文化选择的、与本土有关联的特征展现。如果想把对西方世界的风土建筑所作的记录转化到更广泛的天地，需要适当的调适，或者说转化（interpretation）的过程。人类学家在今天有责任预防那些仓促的规划设计，利用对于当地语境的了解和熟悉，指出形式和功能以及意义的内在联系，阐明看起来相似的形式是在不同的社会中产生，有其不同的意义，同时相近的意义可能会有多种表现形式。换句话说，来自人类学的研究动机的更新正是出现在对“族群特性”（ethnicity）的缔造中，虽然“没有建筑师的建筑”里没有建筑师，但并不是没有建造者，要关心建造者的动机变化和在相应语境下的调整，如此或可迎来风土建筑的复兴。

通过回顾和展望，人类学家们也开始发现风土建筑是一个有前景的学科。原本，人类学家对待风土建筑的态度基本是将其视作可以阅读的“文本”，通过研究这一文本发展“阅读”能力；现在学科之间互相多有借鉴。发展中国家的建筑师越来越多地意识到传统手工艺和建筑遗产的价值，在进行记录的同时也较多关注其技术、功能与美学价值。或者说，建筑师开始尝试以人类学式的方法进行风土建筑研究的这种趋向在 1960 年代之后变得逐渐明显，这在建筑学内部来说，也构成了一种建筑史学的大转向。

3. 作为展望风土建筑未来走向的保护方法论

在风土建筑的研究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成果由遗产保护学构成，其研究驱动力也不同于前述研究者。建筑学中的“保护”意味着三点：第一，对建筑及其周边环境免于损坏的保护；第二，尽量使用原材料和技术进行维护；第三，在满足第一项条件下继续使用。之所以“保存”（preservation）一词如今在许多国家在牵涉到建筑实践时，仿佛成了一个消极的词，是因其包含以上的前两项内涵，但没有将第三项“继续使用”囊括其中，也就是说“保存”的结果往往是停止建筑的使用，将建筑作为一个特殊对象清空和不再利用，甚至使用不合适的材料进行维护以使建筑“看起来”更真实，而一系列环境作用例如风化很快会暴露这些不当干预造成的后果。与此同时，“保存”其实也可以成为带有“修复”（restoration）内涵的词语被更为谨慎地使用。因为修复一栋建筑往往意味着去掉历史过程中的添加物，而使其恢复到某一历史阶段的样貌，以显得更为“完整”“真实”或者“美观”，它必然带有某种推测性的重建和破坏，建筑的“真实性”（authenticity）在这个过程中受到损害。特别地，“修复”一词现在已经被意指对建筑的外观品质进行大量的改变，将岁月的痕迹去除，将其恢复到过去某一时间的原初状态。岁月的古色（patina）是风土建筑最美之处，对它的破坏往往令人悲叹。更糟的是，修复通常会与“风格纯净”（stylistic purity）相联系，对建筑某些元素的去除就不一定遵从历史的层累，建筑在更早期形成的元素也会因为被判断为并非这些风格的组成而被去除。明知修复的不准确却依然如此做的名义也就是所谓的“理想的”真实性。此外“更新”一词意指出于建筑再使用目的进行的维修，但并不包含对原材料和肌理的尊重，只有“保护”（conservation）包含了避免损害性的变化这一内涵。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词语被专业的艺术品修复者使用时的情况不同于这些词语在建筑领域的使用。关于保护原则中的可识别性和最小干预，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先不考虑保护对象是否继续使用的问题，在实际修复中更具争议的是新旧材料的可识别性问题，这一观点的来源主要在于，对普

通大众而言，建筑的价值首先是美观这一点，历史建筑的保存对他们的首要意义就在于通过实地考察增长历史知识，他们并不会关注新旧材料区分这一点。对于建筑师和建筑鉴赏家而言，他们更倾向于不要反映区别的修复，或者至少在一定观察距离外看不出新旧材料的区分。考古学家与科学家则倾向于最大程度的区分，包括一砖一瓦的区别。摄影等记录技术的发达对于保护论者来说，减少了这种视觉可识别性的必要，因为这种区分带来的问题在于使建筑减色，损坏了美学完整度，使得建筑外观呈现一种令人担忧的“病态”。表面看，提出的是修复中材料可识别性的问题，但毋宁说是一个缠绕一个多世纪的争论。

至 19 世纪中叶，修复思想首先在古典浪漫主义运动中获得支持，此时哥特复兴式建筑大行其道，策源地主要是法国与英国，以维奥莱·勒 - 杜克（Viollet-le-Duc，1814—1879）和乔治·吉尔伯特·斯科特（George Gilbert Scott，1811—1878）的修复思想为代表。他们定义的修复师乃“艺术家兼再造者”（artist-recreator），将修复师看成与建筑原设计者一样。修复，在他们眼中，承担着一项责任，即将建筑作品从后来的妨害和自身的不足中解放出来。目标就是使它真正获得形式的解放。正如勒 - 杜克所言“修复这一术语及其修复这事本身是现代的产物。对于一座建筑的修复并不意味着去保存它、修补它或重建它，而是要将其重新复原到一种完整的状态（a condition of completeness），而这种状态有可能从未在过去任何已有的时刻存在过。”[11] 他们发动了一项运动引进“改善”（improvements）这一理念，改善的对象不仅包括宏伟的纪念碑建筑，也包括许多古老的风土建筑，之所以包含风土建筑，可能因为风土建筑缺乏图档资料，尤其难回到过去的状态中，许多证据在历史过程中都已丢失了。

这种极端的道路必然引发不同意见。1839 年由剑桥大学的学生发起，在英国成立了卡姆登协会（Camden Society）以保护中世纪教堂，这是较早保护历史建筑的公共组织。1877 年，由拉斯金（John Ruskin）发起成立古建筑保护协会（the Society for the Protection of Ancient Buildings，SPAB），以他为主发起对修复的质疑，在他看来修复意味着建筑遭到完全的破坏，伴随这种破坏则是对所破坏之物的错误描述。这一运动逐渐伴随着一种越来越强大的信念，建筑的美在于与手工匠艺（craftsmanship）的联系。这一价值认知的结果便是 1875 年前后在英国兴起的工艺美术运动，这一运动由拉斯金和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引导，核心在于关注手工艺的恢复。莫里斯的理由是在手作劳动中个人得到的满足感是工业生产无法替代的，以及手工匠艺在活化和恢复传统中的重要角色。

在 19 世纪末的二十余年内，以修复对建筑进行某种更审慎、合理的“艺术化的再创造”由重要的建筑理论家阿洛斯·李格尔（Alois Riegl，1858—1905）和卡弥洛·博伊托（Camillo Boito，1836—1914）领导。到 1932 年，意大利的乔万诺尼（G.Giovannoni）赋予“修复”现代意义上的认识。20 世纪起，随着一系列保护领域的国际性会议召开，诸如马德里会议（1904 年）、雅典会议（1933 年）、威尼斯会议（1964 年）等，保护工作者试图针对保护实践中的再创造和更新利用之间达到一种调和，形成恰当的原则和技术，其制定的原则和宪章被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广泛应用。这些会议的成果之一就是 1965 年在巴黎成立的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nternational Council on Monuments and Sites，ICOMOS），关注保护所有的建筑类型，也包括风土建筑，并在 ICOMOS 中设立传统与风土建筑保护的分理事会。与这些进展并行的是对单栋建筑扩展到整个城乡环境的保护策略，1972 年的联合国遗产公约名单包含 100 个自然遗产和 300 个人工遗产，其生态保护理念中已经包含风土建筑保护的目标[12]。

但就保护工作者的总体工作情况而言，风土建筑保护的进展十分缓慢。普遍地看，来自于范围有限的保护理念，保护对象基本还是限于要么具有国家层面的价值，要么具有特殊艺术风格价值或者承载历史事件和人物事迹的风土建筑。以英国为例，1895 年建立的英国国家信托（National Trust）至 1992 年受捐赠计 200 栋农舍和风土建筑，大部分并不对公众开放，该信托相关风土建筑的书籍也是到近期才开始出版，从乡村历史环境风貌的角度对风土建筑群及其所属自然保护区进行整体性保护和适度干预则是英国战后重建的规划内容之一，不属于单体为介入尺度的保护方式。

风土建筑的现代保护的实践中，融入了博物馆学角度的研究，主要成果在于露天博物馆和生态博物馆的概念产生，作为一种保护和展示风土建筑的新方式。鉴于大量的风土建筑实存有着抢救性保护的需要，很有必要对这种研究方式进行研究。露天博物馆的概念是 100 多年前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国家里产生的，而生态博物馆则是在 1970 年代的法国产生。

在 1867 年的巴黎世博会上，一座瑞典农舍的复原和一座挪威的楼阁小屋作为国家出口物参加展览。同时，瑞典人还展示了 1：1 的瑞典民俗生活模型。1891 年，亚瑟·哈兹里乌斯（Artur Hazelius）在斯德哥尔摩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座露天博物馆——斯堪森露天博物馆（Skansen open-air museum），这是一所完全在户外的民俗博物馆。这种新的博物馆形式有两个目的，一是在园区展示完整的传统建筑，二是再造建筑内部的民俗生活陈设。

从 19 世纪的末期开始，地域传统和风俗开始在这些由国家设置的露天博物馆里陆续展出。这些博物馆临近首都，从全国各地收集建筑。建立者一般是具有很强民族感的学者，有着“教育”意识，具有对风土建筑如画本质的鉴赏力。露天博物馆的概念先是很快传到挪威，1912 年在阿纳姆（Arnhem）建造了挪威的国家露天博物馆（Open Air Museum in Arnhem）。1936 年，罗马尼亚在布加勒斯特建造了第一座国家露天博物馆（Muzeul Satului），被认

为是欧洲最好的露天博物馆之一。美国第一座露天博物馆威廉斯堡殖民地博物馆（Living History Museum of Colonial Williamsburg）在1926年建成。二战后，露天博物馆的概念也传到了欧美之外的地区，日本、印尼、印度和一些非洲国家均开始建造露天博物馆。欧洲露天博物馆的展示较为强调风土建筑的地域差异，美国露天博物馆的展示注重展示各历史时期中风土建筑的变化，而在日本则强调传达民族特色和风土建筑的进化线索。

进一步地，法国博物馆学家乔治·亨利·里维埃（Georges Henri Riviere）将露天博物馆的概念发展为在原址建造生态博物馆，更强调对原地的自然和社会环境的整体性保护。这就不限于仅仅把建筑搬到现场，更为重视原地保护而不是移建，例如法国的勒蓬德蒙特韦尔（Le Pont-de-Montvert）的洛泽尔山（Mont-Lozere）生态博物馆有许多农舍，访客可以顺着特殊的动线连续参观。

露天博物馆的发源不能仅仅由博物馆学的发展来解释，其出现进一步代表的是风土建筑价值认知和保护的发展。一方面随着西方国家对民间文化的兴趣增长，逐渐意识到乡村失落的传统需要保护；另一方面风土建筑被认为表达了民族的最高精神，露天博物馆因表达国家身份和民族特点的需要应运而生。露天博物馆诞生一百多年后，很多国家接受了这一概念，但是也产生了新的质疑声。博物馆中所展示的风土建筑类型多样，涵盖农民、牧羊人、渔民和手工艺者的房屋，博物馆中的建筑在异地重建之后处于一个过于干净和完美的环境，就这一点看就已经违背了某种真实性（authenticity）。因此，风土建筑展示中很重要的一项考虑将是关于材料真实性和视觉真实性的矛盾如何解决（图 4）。

4. 作为风土建筑整体化研究基础的生态学方法论

在风土建筑研究中的生态学方法，指的是使用“人文生态学”（human ecology）中的整体性角度，将人类的活动、产物、规范和各种协调因素都视作是地球表面这一生物圈范围里的解读对象。这一框架包含三种逻辑关系要素，第一是“生物逻辑”，即所有生物有机体包括动植物在内的规律；第二是“生态逻辑”，即包含有机组成物的大气、水、土壤和日照的规律；第三是“人类逻辑”（anthropologic），即文化、社会和个体要素例如社会习俗、仪式和价值观等。

Ecology 这个词来自于希腊古老的词汇 oekologie，由 oikos 和 logos 组合而成，意思是“栖居的科学”。在 1873 年由德国动物学家海克

图 4：世界遗产白川乡村“合掌造”修复后

尔（Ernst Haeckel）首次使用，用于指生物体和其周围环境的联系。其中，“人文生态学”关注人类及其所有的习俗和活动。每种习俗都会使用到与生态相关的自然资源，人文生态学角度的一项实体研究对象即为土地以及聚居其上所需要的物质资料，包括用于建造风土建筑的构筑材料等。

这类研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罗伯特·奈汀（Robert McC. Netting）在1981年完成的研究。瑞士山村特伯尔位于菲斯普山谷，罗纳河南部，海拔1500m，是一处古老的聚居地所在，建有许多木结构房屋以及覆盖着石板瓦的谷仓。它的周围是干草场、牧草场、菜园，坡地上有葡萄园，后部区域是冷杉林和松树林。奈汀意欲揭示的是，这些美丽的聚居地并非是自然的风景，而是作为聚居地的自然资源被世世代代利用形成“文化复合物”。奈汀将村庄看作一个小的生态系统，其基础是小规模的自给经济，这个系统反映的是当地资源的变化和人口的扩张、集约化和限制。例如，木材这一自然资源对村民而言不仅是建筑材料和燃料来源，也是保存泥土、防止雪崩、保护分水岭的重要依靠。木材在房屋建造以及取暖和烹制食物时被精确使用，均是为了保有木材储量，减少损失的风险。村庄中2/3的建筑是住宅，而1/3是仓储用途的建筑，这种数量分布也反映了依靠自给经济的居民重视储粮的程度[13]。

斯蒂芬·博伊登（Stephen Boyden）的观点流传甚广。他认为，生物圈与人类社会的关系可以分为四个生态学上的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狩猎采集阶段”，这是最漫长的阶段；下一阶段是“农耕阶段”，定居的习惯在这个阶段建立；接下来是“都市徙居阶段”，大约是200代人以前开始；以及“高能耗阶段”即大约8代人之前开始，此阶段对所有资源进行利用的习惯被大量普及。博伊登对这些阶段的概括涵盖了对食物的利用、人类居住地的建造、能源使用、废物循环等。博伊登的理论或许能用以观察建筑材料在这几个阶段中的变化。在一个更宏观的角度上来看，7000年前定居刚成为人类的习惯时，建筑一般是由太阳烘干的土坯，天然纤维和石材建造。随着殖民主义和工业化的发展，可用于大量建造的材料例如钢材、水泥和玻璃逐渐地代替了传统建造材料。同时，运输的发达使得进出口建筑材料、传播建造技术都变得便捷。本土文化中传统的建造工艺逐渐消亡，建成环境的布局和结构的变化对材料和能源的消耗产生极大影响[14]。

生态学的方法也可以用来说明风土建筑的布局、结构，以及日常用途如何与居民的生活方式、宇宙观、仪式活动，以及家庭与社群的组织结构产生联系。已有大量证据表明，许多古老的城镇和建筑均与宇宙观有关，借用人造环境可以反映宇宙的秩序。总体上看，在宇宙论和创世神话中有两个主要的版本。一个是神人同形论（或者是跟某种环境中的元素类似）。第二种是认为宇宙的方位有着不同的价值诠释，这六个方向是：东南西北上下。比如，以斯坦沃特（R. J. Stewart）的研究为例，他认为爱尔兰和印度虽然是截然不同的国家，但在印欧文明中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均被转译为实际意义的区域，也在建造的房屋中体现：采用好的方向才可以得到神灵的保佑[15]。

风土建筑或聚落反映本土匠艺和此地人或是有意识或是无意识的生活观。但是这种密切关联有的时候很难被外部观察者体会，也无从解读。生态学的角度提供一种解答角度，即通过建立概念框架，将自然科学譬如生物学、化学、地理，与人文学科譬如人类学、人口学、经济学等结合，将发散性的学科结合于综合性的风土建筑研究中。因此，生态学截然不同于建筑师和社会学者的观点，风土建筑所处的环境并不是一种中立的背景，而是复杂、多维、动态的“文化复合物”，因此对风土建筑的研究需既涵盖其物质组成，也研究布局、构造等非物质材料部分，并从中解读出社会习俗、仪式和价值观。

三、结论：风土建筑现代学科化成果的批判性吸收

今天看来，只局限于从一个角度进行风土建筑的研究是不完整的，比如只从建筑学本身的角度来撰写，就会丧失这一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因为风土建筑的重要特点是其“环境——文化”这一双重内涵[16]，其关联研究的最大特点是牵涉现代取得飞速发展的多学科交汇，风土建筑学科的真正发展也有赖于相关学科的综合性推动，正如奥利弗在《世界风土建筑百科全书》中指出的：

> 对风土建筑的研究没有单一的方法，作为一门尚处于被定义为学科的对象，既受到缺乏协调的方法的影响，同时又受益于各种研究方向所带来的角度的多样性[16]。

从学术研究和遗产保护的角度出发，对于风土建筑的研究会带有教育后来者的意图，在建筑方面指出某些基础原则，并探索特定的特征，比如如何进行气候调适，还可能出于建筑的专业作用，探讨如何将当代设计与地域传统联系起来，寻求使用当地的技艺以满足当地的需要，解决低成本住房的问题，也可能是单纯地将记录风土建筑传统作为个人建筑求知的一部分等。各个领域的研究都可能存在各种各样的动机和兴趣，会影响研究方向以及支持理论的论据，这些研究角度的多样性也构成了风土建筑研究及其方法论呈现多学科、综合性的特点。

上文归纳的学科方法中，列举了具有代表性的现代学科方法和相关研究成果，作为解释风土建筑研究的观察角度和动机，以及分辨各类研究隶属于或受益于哪些方法，分类的结果或可有一定参考价值。在这些学科及对应的方法中，某些方法和概念是重叠的，有些则需要进一步研究和探讨，而某些预设的问题意识将直接指引研究方向，同时也反映出一种研究惯性带来的“偏见”，这也留待今天的风土建筑研究者和保护工作者进一步批判性的运用和思考。

注释

① 常青 . 序言：探索我国风土建筑的地域谱系及保护与再生之路 [J]. 南方建筑，2014 (5)：4-6.
② Henry Glassie.Folk Housing in Middle Virginia：A Structural Analysis of Historic Artifacts[M].University Tennessee Press，1976.
③ Marc-Antoine Laugier. Essai sur l′ architecture[M].Paris：Duchesne，1753.
④ William Chambers.A Treatise on the Decorative Part of Civil Architecture[M].London：J.Haberkorn，1759.
⑤ Gottfried Semper.Der Stil in den technischen und tectonischen Künsten，oder praktische Äesthetik [M]. Frankfurt，1860.
⑥ Lewis Henry Morgan.Houses and house-life of the American aborigines[M].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5.
⑦ Claude Lévi-Strauss.The Ways of the Masks[M].Translated by Sylvia Modelski.London：Jonathan Cape，1983.
⑧ Durkheim，Emile and Marcel Mauss.De quelques formes primitives de classification：contribution a 1'etude des representations collectives[J].Annee sociologique，1903 (VI)：1-72.
⑨ Clark E. Cunningham.Order in the Atoni house[M]. Leiden：Bijdragen tot de Taal-Land，1964.
⑩ Pierre Bourdieu.The Berber house or the world reversed[J]. Centre de Sociologie de la Culture et de l'Éducation (Volume 9) .1970 (2)：151-170.
⑪ Eugène Emmanuel Viollot-le-Duc. ″Restauration″ [M]// Dictionaire Raisonné de l ′Architecture Française du XIe au XVIe siècle (1854-68) vol.VIII.Paris，1866：14-34.
⑫ Paul Oliver. Encyclopedia of Vernacular Architecture of the World[M]. 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23.
⑬ Robert McC. Netting.Balancing on an Alp：Ecological Change and Continuity in a Swiss Mountain Community[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1.
⑭ Stephen Boyden.Western Civilization in Biological Perspective[M].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7.
⑮ R.J.Stewart.The Elements of Creation Myth[M]. Elenment Books，1989.
⑯ [美] 阿摩斯·拉普卜特 . 宅形与文化 [M]. 常青，等译 .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7.
⑰ Paul Oliver. Encyclopedia of Vernacular Architecture of the World[M]. 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vii.

参考文献

[1] 常青 . 序言：探索我国风土建筑的地域谱系及保护与再生之路 [J]. 南方建筑，2014 (5)：4-6.
[2] Henry Glassie.Folk Housing in Middle Virginia：A Structural Analysis of Historic Artifacts[M].University Tennessee Press，1976.
[3]]Marc-Antoine Laugier. Essai sur l′ architecture[M].Paris：Duchesne，1753.
[4] William Chambers.A Treatise on the Decorative Part of Civil Architecture[M].London：J.Haberkorn，1759.
[5] Gottfried Semper.Der Stil in den technischen und tectonischen Künsten，oder praktische Äesthetik [M]. Frankfurt，1860.
[6] Lewis Henry Morgan.Houses and house-life of the American aborigines[M].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5.
[7] Claude Lévi-Strauss.The Ways of the Masks[M].Translated by Sylvia Modelski.London：Jonathan Cape，1983.
[8] Durkheim，Emile and Marcel Mauss.De quelques formes primitives de classification：contribution a 1′etude des representations collectives[J].Annee sociologique,1903(VI)1-72.
[9] Clark E. Cunningham.Order in the Atoni house[M]. Leiden：Bijdragen tot de Taal-Land，1964.
[10] Pierre Bourdieu.The Berber house or the world reversed[J]. Centre de Sociologie de la Culture et de l′ Éducation (Volume 9) .1970 (2)：151-170.
[11] Eugène Emmanuel Viollot-le-Duc. ″Restauration″ [M]// Dictionaire Raisonné de l ′Architecture Française du XIe au XVIe siècle (1854-68) vol.VIII.Paris，1866：14-34.
[12] Robert McC. Netting.Balancing on an Alp：Ecological Change and Continuity in a Swiss Mountain Community[M].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1.
[13] Stephen Boyden.Western Civilization in Biological Perspective[M].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7.
[14] R.J.Stewart.The Elements of Creation Myth[M]. Elenment Books，1989.
[15] [美] 阿摩斯·拉普卜特 . 宅形与文化 [M]. 常青，等译 .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7.
[16] Paul Oliver. Encyclopedia of Vernacular Architecture of the World[M]. 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
[17] 潘玥 . 西方现代风土建筑概论 [M]. 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21.
[18] 潘玥 . 风土：写在现代的边缘——探索现代风土建筑理论流变的历史 [J]. 建筑学报，2023 (01)：82-89.

图片来源

图 1：来自于 Photo A. F. Kersting
图 2、图 3：来自于 Paul Oliver. Encyclopedia of Vernacular Architecture of the World[M]. 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
图 4：作者拍摄